

“三农”决策要参

2014年第2期(总第58期)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4年1月20日

嘉善市民化调研手记与思考*

内容摘要:农民市民化问题分为本地农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两块。通过我们在浙江的调研发现,浙江经济发达地区本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较高,加上农村户籍所附着的种种福利,本地农民市民化意愿较低。外来人口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提供年轻而充足的人力资源,为人口生育意愿较低的浙江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有着较强的市民化意愿。本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已经接近市民,改变户籍并不能增加其需求。外来人口市民化则将改变其生活和消费习惯,大幅度增加内需,缓解社会矛盾。未来,浙江发展应该珍惜这部分外来人口,将外来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抓手。考虑到嘉善吸纳能力有限,未来城市发展应该以产业发展需求确定外来人口吸纳量,以财政实力确定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包的大小和以现状为基础决定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先次序。通过系列改革,在让外来人口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伪农村化 市民化 嘉善调查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3年暑期调研成果。

笔者在嘉善调研过程中，总共随队访问过7个当地村庄，它们分别是，优家村、大云社区、武长村、城东村、城桥村、魏南社区和李家社区。笔者将通过4个部分阐述调研的见闻，第一部分界限模糊的城与乡，主要描述在当地调研的直观感受；第二部分开发区的建立和外来人口的集聚唤醒土地沉睡的价值，探究嘉善农村城市化背后的根源；第三部分外来人口的贡献及市民化意愿，分析作为当地财富源泉的外来人口如何对当地做出贡献以及他们的市民化意愿；第四部分嘉善的选择及未来的对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嘉善应该怎样对待和吸纳外来人口。

一、界限模糊的城与乡——“伪农村化”问题

笔者在当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城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主要体现在物理外观、经济繁荣程度和居民享受的权利三个方面。

从物理外观上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住进了整齐划一的农村新社区。农民一般都住在3~4层的小楼内，这些小楼和城市的楼盘基本没什么区别，有些小洋楼甚至比城市的楼盘更加舒适。这些村庄的新社区建设基本都采取统筹自建的方式，村里请专家统一规划地块和外观，由农民自己出钱新建。在城郊附近的村庄，多数因为开发区建设，土地全部被征用，建立了新社区。在远郊的农村，则通过增减挂钩项目建新社区，比如姚庄镇的武长村。新社区的宅基地按照人口划分，享受不同的面积。两口人分50平方米，三口人分75平方米，四口人分110平方米，五口人封顶

(再多人口也不多分地)分 125 平方米。原来村庄的宅基地，按照每家的承包地面积和宅基地情况享受补偿。如果是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高一些；如果是增减挂钩项目的，补偿标准稍微低一些。在当地建一个 3~4 层装修好的小洋楼大概要花费 40~50 万元，当地农民收入本身就不低，加上原本村庄房屋拆迁的补偿，农民基本都能够自己将这些小洋楼建好。

从经济繁荣程度上看，这些村庄由于人口集聚，经济的繁荣程度与城市的差别也小，甚至达到城市的水平。以优家村为例，该村常住人口 1500 人左右，外来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 13000 人，现在达到 9000 人左右。作为一个村庄，手机店、电脑店、广场、电影院、银行网点、超市等一应俱全。仅优家村一个村庄，总共有 13 家手机店^①。大的超市也有 5 家，水果店、杂货店等商铺更是不可胜数。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村的主干道上到处都是人，人们吃烧烤逛街，享受着夜生活。不仅是优家村，大云社区、城东村、城桥村和李家社区等都是类似的情况。如果一个村庄只有五六百的常住人口，其需求仅仅能支撑起一个杂货店，且杂货店的老板半天工作，半天都是在晒太阳。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多数农村看到的场景。可是如果一个村庄的常住人口达到万人以上，其经济繁荣程度则是惊人的，基本已经与城市没有差别。或者如果仅仅按照人口密度的指标，这些地方已然就是城市。

^①这些手机店一年收入将近 20 万元，早期手机店少的时候，每家手机店每月有 3 万元左右的收入。

从居民享受的权利角度来看,许多农民既可以享受城市户口所带来的好处,也可以享受农村户口所带来的好处。以魏南社区为例,魏南社区原本是魏南村,位置处在县中心城区,和嘉善县实验小学只有一路之隔。该村是因为当时征地拆迁而建的社区。魏南社区的居民子女入学划片的时候,享受与城市人口一样的待遇,直接进入县实验小学读书。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魏南社区依旧保留着村庄治理模式,他们还有村支书和村主任,还有集体资产,在计划生育方面享受农村居民的二胎政策。一句话,该社区的居民享受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优质公共服务的组合。一个案例印证了这个事实,魏南村当时要改成社区的时候,部分村民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丧失农村的福利。村支书劝说他们,虽然表面上村改成社区,但实际仍然享受农村福利,另外还能享受城市的福利,何乐而不为。如果仅从享受福利的角度,已经很难看出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区别。像魏南社区这样的村庄,在当地不在少数。

在当地调研时,有趣地发现,当地的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更加金贵。农民愿意保留农村户口,甚至为不能保留农村户口而闹事。从农民的角度讲,保留农村户口能够享受村集体的分红,承包地和宅基地如果遇上征地拆迁能够得到一笔补偿,保留农村户口还能在计生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户口依然可以享受到不错的待遇,农民没有换成城市

户口的激励。早年有些人花钱将农村户口换成城市户口的，现在他们懊悔不堪。就算是地理位置偏远的农村，也有土地升值和未来征地拆迁或是参加增减挂钩项目的预期，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现在村里面，连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学的学生都要求不迁出户口，保留农村户口。城东村有些居民，求学和参军的回到村里之后，由于村庄不让他们回迁农村的户口，他们还与村委会发生冲突。

这次在嘉善调研，最大的感受是，嘉善的现状对于传统的城市和农村分界线产生冲击，城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换个角度思考，城市究竟怎样来定义？什么是城市？如果按照国际的定义，城市就是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达到或者超过一定的阈值。现代城市就是当人口密度达到规模，分工专业化，人们专注做一方面的事情，相互满足对方的需求。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促使人口的积聚，服务业为了满足高密度人群，越来越发达，从而相互促进，直到城市变成更大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讲，嘉善很多农村已经可以算作城市了。嘉善许多本地农民，享受着城市的繁荣生活，同时享受着农村户口所带来的福利，他们市民化的意愿非常的低。推进新型城镇化，就算把他们的农村户口强制换成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不会有所改变，对于内需的拉动也是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笔者认为，推动的“人”的城镇化，发达地区本地农民的市民化不应该是重点。

这么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伪城市化的问题。说很多

地区仅仅是造了空城，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人口集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却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被列为城市人口。在浙江农村则有另外一种趋势，笔者称之为“伪农村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改变，村庄由于人口集聚，经济密度已经达到城市的水平，但是他们仍然因为行政区划划分的关系，被列为农村人口。之所以出现伪城市化和伪农村化的现象，主要因为我们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统计主要根据行政区划确定，并不是根据经济繁荣程度。如果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来看，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就在于人口密度的差别。推动新型城镇化，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改善统计方式，试着按照国际的城市化统计标准，把伪城市化和伪农村化的现象都剔除掉。做好统计工作，了解现状，才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开发区的建立和外来人口的集聚唤醒土地沉睡的价值

嘉善在城郊附近的农村，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都很富裕。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各有强弱，其村可支配收入从四五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多数村庄其收入来源中稳定性收入主要来自两块，一部分是建设工厂厂房而得到的租金，另一部分是建设沿街店面收取的租金。嘉善有名的富裕村李家村，单靠标准厂房的租金，每年的收入就不少。李家村2011年村集体的可支配收入是1028万元，支出550万元，分红是400万元。这1028万元中，厂房出租得到700万元的收益，200万元靠建厂房的店面出

租，现在总共的集体资产上亿元。李家村之所以村集体财力雄厚，主要是因为2000年该村征地拆迁的时候，村里在开发区定了300亩的土地，建标准厂房准备出租。当时购买每亩地花6~8万元，买土地总共花了1500万元，村里还从银行贷了300万元的款。标准厂房由此成为李家村源源不断的收入流^②。而大云镇优家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沿街店面收取的租金。2003年以前，优家村原本是个贫困村，2003年县里建立开发区将原本优家村的土地全部划在内，优家村由此需要整村搬迁。村集体随后利用村里拆迁的补偿款的一部分，建设了沿街的房屋。这些沿街房屋的租金收入成为了优家村村集体的主要财源，2012年租金收入达到410万元。

嘉善当地的村民也很富裕。只要附近有开发区，村民就能从租房收入中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加上村民务工的收入，村民生活殷实。农民建的小楼里面一般有8~10间房子用于出租，

^②李家村之所以村集体财力雄厚，主要因为在2000年征地的时候村支书有远见。村支书在2000年全村征地拆迁之前，就利用村里土地建厂房，通过出租厂房每年获得150万元的收益。征地拆迁，李家村整个村的地都没了，当时李书记想，如果村的收入都没有，靠征地补偿款的话，只能是坐吃山空。当时征地的总补偿是3000万元，其中征地补偿2000万元，农田1万元1亩，宅基地道路5000元1亩，总共3200亩土地，村厂房拆迁补800万元。总之，青苗补助、房屋补贴等零零总总加起来，每亩补2.8万元，由于当时县财政有限，每亩还有1万元没给。为此，李书记就在开发区定了300亩的土地，建标准厂房准备出租。当时购买每亩地花6~8万元，买土地总共花了1500万元。当时李书记同意拆迁的条件就是要求银行贷款。当时还从银行贷了300万元的款。由此解决了手头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并为李家村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每个租户的租金每月 150~250 元不等，平均每个村民每年光租金收入就有 2~3 万元。用村民的话说，躺着都能挣钱。与此同时，没有了土地的村民又去工厂打工。按照一个人一个月 3000 元计算，夫妻双方进厂务工加上家里的租金收入，夫妻二人一年收入 10 万元在当地属于很平常的。

笔者在嘉善调研，始终萦绕心头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嘉善城乡结合部的村集体和村民如此富裕？笔者认为，开发区的建立和外来人口的集聚唤醒土地沉睡的价值。

嘉善城郊附近的村庄都很富裕，村支部大楼建得很漂亮，但是在 2000 年前后的时候，这些村庄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村庄，有些村庄还是贫困村。这些村庄的发家史全部要追溯到 2000~2003 年之间。这段时间内，许多城郊的村庄原本的土地被划入开发区，整村进行搬迁。有些村庄凭借征地拆迁的补偿款，建立了标准化的厂房和沿街的楼房，村集体从此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富裕了起来。

由于当地开发区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主要是电子厂、木业厂和服装厂，这些企业招收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随着外来人口增多，由于工厂厂房不能够提供那么多的住宿，加上工厂的集体宿舍管理严格，隐私保护也比较差，外来务工人员都比较愿意租住农民在宅基地上建的房子，一年租金在 2000~3000 元之间。这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来源之一。而这些外来人口的集聚，他们对于食品、服装等各类消费品的需求，繁荣了当地的经

济。不仅吸引更多商贩来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而商贩云集导致沿街租金上涨，又提高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用当地村民的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是“靠厂吃厂”。所有村集体发迹的故事都与土地有关。村民因为拥有的宅基地，也分得一杯羹。

说到底，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原本贫穷，但是他们有大量的资产。村民有不少承包地和宅基地，而村集体则名义上是所有村庄集体土地的主人。秘鲁的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写到，秘鲁的穷人并不缺乏资产但是缺乏资本，缺乏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权属表达和经济基础，没有办法将资产中释放的势能释放出来。笔者在浙江调研看到的情况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当开发区建立带来了外来人口大量积聚的时候，原来土地（资产）的所有者将从这个过程中大量地获益。当经济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时候，资产的势能将无可阻挡地释放出来。

三、外来人口的贡献及市民化意愿

外来务工人员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群体。改革初期，外出务工人员被当成是盲流加以驱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策才开始有所调整，改成鼓励支持他们有序流动。时至今日，在许多地方，外来人口仍然被当作是城市发展的负担。国内有不少大城市提出“城市承载力”的概念，旨在限制过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前往城市。

我们在浙江看到，外来人口集聚确实给当地政府管理带来

挑战。在2003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外来人口逐渐增多，他们中有人带给当地繁荣，有小部分则带来盗窃和刑事案件。不过嘉善选择是主动迎接挑战而不是被动应对。嘉善是浙江省最早成立新居民局的县，从2005年开始，嘉善县通过对外来人口进行统计并有序管理，力图让他们为当地更好地做出贡献。外来人口在当地也被亲切地称为“新居民”或者“新嘉善人”。通过嘉善县政府的不懈努力，外来人口从动荡之源，变成财富之源。老乡说，早年外来人口刚来的时候，确实带来盗窃和刑事案件的问题。于是各个村庄建立派出所、新居民管理所和护村队，同时对这类刑事案件严加惩处。通过严厉打击之后，各类犯罪案件开始逐步减少。老乡还说，多数外来人口还是想来赚钱的，他们希望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收入改善家庭生活。人都是有好有坏，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好的占大多数，坏的是一小部分。当地通过适当地管理之后，基本能够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外来人口与当地的关系也日渐融洽。当地干部说，将心比心，对待外地人，“你怎么对他，他们也怎么对你”。现在嘉善各类刑事案件都在减少，治安变好了。用老乡的标准是，饭店多、摊位多的地方，治安一定是好的，否则小商贩根本无法经营。有许多外地人与当地村民相处融洽，有些外来人口在当地，自从房东2003年建新房子之后就居住在那里，与房东关系融洽、相互帮助。大雨来的时候，房东和房客相互帮助收衣服、买菜，平日里常有寒暄和问候^⑤。总体来说，虽然外来人

口大幅度增加，嘉善当地本地人与外地人比例达到1:1，外地人甚至更多一些，但是当地社会秩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动荡，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人与外地人相处融洽。

笔者在浙江的观察，外来人口非但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只要城市管理跟得上，他们将变成流入地财富的源泉。外来人口衣、食、住、行在当地都能成为繁荣的源泉，本地人的资产也因为外地人的到来而升值。与此同时，外地人还给流入地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嘉善本地人的生育意愿低，嘉善是浙江省计划生育模范县，当地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嘉善户籍的小学人口每年仅有6000，而且数量不断下降。如果仅仅是本地人，由于老龄化和新生儿较少的问题，嘉善小学可能和发达国家的小学一样，较为冷清缺乏活力。但是嘉善当地小学的实际情况是，人满为患。

嘉善户籍小学生6000人，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有1.6万人。嘉善的小学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小学中充满了竞争的意识。其实，外来人口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移民。对于移民来说，他们选择“迁徙”本身就是不安于现状和进取心的表现。外来人口中很多是其他省份优秀的人员，他们的子弟也同样优秀。这些孩子将来能够成长为高素质的新嘉善人。一个孩子，他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在哪里就读，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当地的认同。

③外来人口多的副产品，当地居民的普通话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了。因为本地人与外地人需要用普通话交流。

尤其是高中阶段,是孩子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们形成家乡认同的重要阶段,他们会以当地为荣,长大之后为家乡做贡献。假设人群同质,每个地区优秀的人才是一定的,现在外来人口子弟越多,这个地区优秀的小孩就越多,而且他们比本地小孩面临更强的竞争和生存压力,更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嘉善如果下决心解决外来人口教育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将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新嘉善人。虽然培养周期长,但这部分人未来定能为嘉善做出卓越的贡献。而外来人口子女对当地的贡献,仅仅是外来人口对当地人力资源贡献的缩影。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逐渐开始充裕起来,未来人力资源将是更加宝贵和稀缺的资源。外来人口究竟是城市的负担还是城市的财富,关键取决于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的能力。

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定居和落户意愿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会来当地,第二,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定居的原因有哪些?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团队设计了问卷打算做定量研究。笔者通过自己的访谈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外来务工人员之所以选择到当地来,一是因为在当地能够挣钱,二是通过社会网络带出更多的亲戚朋友。外来务工人员到外地,从来不是盲目流动。越穷的人是越不会盲目流动的,他们没有盲目流动的资本。他们到达当地,首先需要维持生计的工作。在流入地能够赚到钱,能够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原

因。而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立足并且致富之后，他们通过社会网络，将这一信息告诉自己老家的亲戚朋友，由此带出一串的外出务工人员。不过现在更年轻些的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考虑子女教育的因素。因为年轻的夫妻在当地能够维持生计之后，他们希望将自己的小孩带在身边。用他们的话说，“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收入低一些也感到幸福”。以子女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未来或许将成为影响农民工迁徙方向的重要因素。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定居的影响因素，通过访谈笔者感觉，这不是一个是否愿意定居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能够定居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反映，嘉善当地确实比家乡好，比如环境好，经济繁荣，而且文明程度和政府治理水平也更高些。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对嘉善当地政府为老百姓服务的态度和颁证的速度赞不绝口，而家乡政府机构办个证却要吃拿卡要的现象让他们深恶痛绝。我们访问的外来人口表示，如果可能，他们愿意在当地定居。相对于年长的外来人口，越年轻的外来人口，学历越高的外来人口，越愿意留在当地。但是，外来人口表示，想要留在当地首先工作需要稳定。因为他们在企业工作，如果企业倒闭了，他们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回老家。另外，相对于嘉善当地的房价，他们的工资显得有些单薄，不足以在当地买房子住。外来务工人员主要还是租房居住，工资收入低些的外来人口租农民家的房子，工资收入高些的外来人口则租城市的商品房。总体来讲，外来务工人员是否能在流入地落户，非不愿实不能

也。

四、嘉善的选择及未来的对策

笔者认为，嘉善未来如何发展，嘉善的管理者们需要统一思想，对究竟该怎样对待外来人口形成共识。我们在嘉善当地政府部门访谈的时候，人社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都表达了对于外来人口的看法。他们基本都是从本部门工作开展的角度出发，叙述外来人口给当地的管理和财政方面带来的压力。笔者认为，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外来人口的集聚，感知到的是有形的压力，是他们工作中面临的挑战。而外来人口对当地的益处和贡献，更多分散在镇和村两级政府和老百姓那里，有些甚至是无形的和长期的，这不容易被政府职能部门直接感知。对职能部门最优的外来人口吸纳量，并不是对全嘉善最优的。

笔者认为，直接测算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然后通过成本来预测外来人口的吸纳量，基本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成本测算都是基于现有制度的测算。如果社保制度、医保制度、教育制度有什么新的改革，这些成本测算也就没有意义。当地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外来人口究竟是对本地的贡献大还是对本地造成的负担大。然后思考，从本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出发，需要吸收多少外来人口。最后才是考虑如果要吸纳这么多的外来人口，财政和管理方面要做哪些配套和改进。假设目前的财政资金不够，是否能在社会保障方面推进某些改革，从而以最少的资金，吸纳最多的外来人口。

嘉善全县区域面积为 506 平方公里，集聚 80 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它的人口密度为 1581 人/平方公里。而国际性的大都市，他们的人口密度都比嘉善高 2~3 倍。上海的人口密度为 4702 人/平方公里，东京的人口密度为 6992 人/平方公里，伦敦的人口密度为 4762 人/平方公里，巴黎的人口密度为 3540 人/平方公里。从人口密度的角度来看，嘉善目前的人口并没有多到不可想。可能相比国际性的大都市，嘉善的管理水平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当然，人口密度高并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它是需要有产业作为支撑的。嘉善目前需要测算的不是吸纳一个外来人口需要多少钱，而是测算嘉善产业发展需要多少外来人口，又需要怎么样素质的外来人口。负责产业发展的部门需要与负责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部门相互协调。我们与当地经信委访谈的时候，他们还没这个概念。他们还在想推动自己的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的计划。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他们只需要负责工业发展，新居民的公共服务提供和县里市民化政策与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大。实际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来是一个整体，经信委当期的腾笼换鸟和机器换人的计划，将直接影响下一期新居民局、教育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下一阶段其实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既包括嘉善的产业发展如何与新居民的公共服务提供相协调，也包括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提供怎样吸纳高质量的、对当地产业发展有利的人才。

当地有许多做出口生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关部门还

需要研究的是，制造业中有多少是做外资生意的，他们对外贸依存度有多大。在外需疲弱、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三重打击下，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它们是否能够长期存续，又能吸纳多少外来人口。还有未来嘉善支持和发展的产业，它们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有多强，嘉善的外来人口又将保持在何种水平。因为企业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它们倒闭了和变化了，外来人口也将随之离去，但是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和投入具有长期性，如何协调不可以忘记。

最后，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确定无限大的公共服务包，政府并不是无限责任的。提供什么不提供什么，什么先提供和什么后提供需要探讨。总体而言，需要根据当地财政实力，确定公共服务包的大小。然后，根据当前当地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的渴求情况确定公共服务提供的优先次序。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外来人口在当地都有房子住，虽然是租住在农民家中，但是多少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比较年轻，身体也比较健康，基本比较少生病，而养老和社会保障还没有提上日程。目前，他们最急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如果子女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外出务工的一家人就能在一起，留守儿童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长久居住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假若当地教育资源有限，并不能吸纳外来人口子女全部就读初中和高中，那么就可以采取积分落户的方

式。首先让那些本地发展需要,为本地做出长时间贡献的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覆盖范围,等到当地有足够经济实力之后,再根据当地实际需求,逐步解决。

总的来说,未来嘉善对于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以外来人口市民化为提高城镇化率的主要抓手,以产业发展的需求确定外来人口的吸纳量。根据财政实力确定公共服务包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共服务包的优先次序。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陈思丞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1 室(邮编 100084)

电话: 86-10-6277 3526

传真: 86-10-6279 6949

电子邮箱: cirs@mail.tsinghua.edu.cn

网址: <http://www.cirs.tsinghua.edu.cn>

刊号: TH-T-1021

(使用本文需征得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同意)